

制度组态视角下城市特征与高质量 外资引入的多元路径研究

吴剑峰¹, 李慧兰², 丁沂昕³

(1. 浙江工商大学 稻盛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学院, 北京 100029;
3. 浙江工商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高质量外资引入是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驱动力。基于制度组态视角, 本文构建了政府、市场和技术的多元制度协同框架, 运用 fsQCA 方法对中国 286 个城市进行组态分析, 探索城市多维特征对高质量外资引入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 单一制度逻辑并不能构成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所有组态中均包含创新要素; 驱动高质量外资引入的组态路径包括政府主导型技术驱动、国内—国际市场协同驱动和技术主导型市场驱动三种; 政府逻辑与其他制度逻辑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当缺乏政府逻辑支持时, 市场需求、创新能力和信息化水平能够发挥替代功能。本文深化了外资区位选择的研究, 为城市保持可持续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提供实践启示。

关键词: 高质量外资引入; 制度组态;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区位选择; 高水平开放

[中图分类号] F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034(2026)03-0048-19

引 言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核心任务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与可持续发展。相应的, 以传统的廉价土地供应、税收减免、财政放权等政策工具驱动的“数量型”外资扩张模式已不适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

[收稿日期] 2025-10-13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军人才培养课题“数字营销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24YJRC04ZD-5YB),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地项目“数字经济时代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与跨国并购绩效: 基于媒体报道视角”(24JD02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平台情境下互补者创业经验与创业绩效: 属性、时间与空间分析”(202560)

[作者简介] 吴剑峰(1974—), 男, 江苏盐城人, 浙江工商大学稻盛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 企业国际化战略; (通讯作者)李慧兰(1996—), 女, 贵州贵阳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企业国际化战略; 丁沂昕(1992—), 男, 山东淄博人,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企业社会责任、创新管理

(王晓红和沈家文, 2015)。《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国发[2023]11 号)强调“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并针对“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出台了相关措施。由此可见,高质量外资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关键引擎。

城市区位选择是高质量外资进入东道国时面临的关键战略决策之一。与一般外资相比,高质量外资在新兴产业布局、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等方面具有更高价值创造能力(王海成等, 2025),其对城市的制度环境、创新生态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区位条件的要求也更为严苛与多元。因此,一个城市要吸引到更多的高质量外资,就必须超越以往简单、短期的单一政策优惠竞争模式(沈立等, 2020),致力于构建长期、系统的可持续竞争力,即通过提升其经济、社会、环境和技术综合优势,系统实现城市最优化发展,形成难以复制的区位优势(杨晓兰和倪鹏飞, 2017)。然而,中国城市体系层级丰富,形成了政府治理效能、市场成熟程度与技术创新禀赋等分布差异,导致各城市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效果存在差异。由政府逻辑、市场逻辑与技术逻辑等所构成的多元制度环境,正成为影响各城市吸引高质量外资的关键结构性因素。

现有文献从政策环境(景国文, 2021)、劳动力(Hou 等, 2021)、基础设施(Shangguan 和 Guo, 2022)等制度要素层面解释一般外资的城市区位选择,但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尚未区分一般外资与高质量外资;二是只关注单一制度要素与外资选址决策的关联,忽视了多元制度要素之间的复杂耦合关系和协同作用(杜运周等, 2020)。本文认为,城市吸引高质量外资不存在唯一最优机制,而是存在多种等效路径。制度组态视角为实现该目的提供了思路(杜运周等, 2020),适用于分析城市制度组态与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复杂关系。本文基于制度组态视角,以多元制度逻辑为理论基础,采用 fsQCA(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构建城市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前因组态模型,重点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基于政府、市场与技术三类制度逻辑的中国城市特征的耦合会形成哪些组态?二是哪些城市特征的制度组态可以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本文对现有外资区位选择的研究形成重要补充和深化。外资区位选择文献主要关注普遍意义上的外资,而本文聚焦于高质量外资,为理解高质量外资的区位选择提供新的实证依据。第二,本文引入制度组态探讨城市特征对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复杂性影响,拓展了外资区位选择的研究视角。第三,外资区位选择的研究大多倾向于使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来考察单一要素的净效应,本文采用 fsQCA 方法更系统地整合城市多维特征,探究不同城市的制度组态如何促进高质量外资引入,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提供新的借鉴。

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东道国城市是一国资本流动和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也是外资企业落地发展的主要空间单元。2025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提升对外开放合作水平作为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的关键环节之一,以此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然而,由于中国不同城市的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差异显著,其对外资的吸引力也迥然不同(陈李强等,2024)。经济发达、行政等级高、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对高质量外资具有更强吸引力(王俊和李慧平,2025),而发展基础薄弱的城市则吸引力较弱(王满四和张延平,2012)。本文从城市层面系统探讨高质量外资引入的驱动因素,揭示城市如何从政府、市场、技术等多个维度吸引更多的高质量外资落地,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启示。

(一) 高质量外资的界定与测量

1. 高质量外资的概念界定

现有关于外资引入的研究主要关注外资数量,较少涉及外资质量的探讨,也未对“高质量外资”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界定。部分研究从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内在影响角度来定义“外资质量”(Cui等,2020),强调其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发展机会等积极作用(Li和Xiao,2024)。刘晔和占思诺(2024)则从技术视角出发,强调外资技术溢出的相关属性,譬如外资创新实力、研发投入、技术转移意愿等。类似地,李金城等(2021)从技术进步视角指出高质量外资能通过技术转移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Shangguan和Guo(2022)从外商投资的产业类型出发,将外资分为高质量、中质量和低质量三类,其中,高质量投资以技术驱动型产业为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国发〔2023〕11号)明确提出“支持外商投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提高利用外资质量。这表明,高质量外资应该从技术创新视角定义,体现其在新兴产业布局、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等方面的价值创造能力(王海成等,2025)。因此,本文将“高质量外资”定义为“具有领先的技术研发能力、管理体系和战略资源,能够直接推动东道国相关产业的技术创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商投资”。

2. 高质量外资的测度

现有文献对高质量外资的测度尚无定论。相关研究主要从两个路径展开:一是构建综合性指标体系,如从盈利能力、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实际规模和出口能力等维度衡量外资质量(Dixon和Haslam,2016);二是深化技术导向的测度方法。譬如,Assanie和Singleton(2002)以高新技术引入强度为标准,通过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结构差异来量化外资技术质量。王海成等(2025)则突破传统规模指标局限,提出以外资研发中心数量来衡量高质量外资。

总体来看,当前高质量外资测度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是高质量外资缺乏一个清晰、统一且可操作的定义,二是缺乏针对高质量外资的直接描述数据。因此,本文根据外资企业是否拥有高新技术资质来衡量高质量外资,理由有三:一是符合当前政策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而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体现就是技术创新。二是与高质量外资的核心特征相匹配。高质量外资通常以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为主,拥有高新技术资质能够反映外资企业在技术创新、研发能力和产业升级方面的实力。三是数据可获得性。企业高新技术资质需要按当地政策要求

申请,在地方政府进行认证和备案,相关信息公开透明、完整性好、时效性强,能够及时反映高新技术外资企业的申请和授予情况。

(二) 外资区位选择

区位选择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关键问题。既有研究区分了宏观与微观区位选择(文余源,2008),本文聚焦微观层面,即城市特征如何影响外资区位选择。现有城市层面研究主要围绕政府、市场和技术这三类制度逻辑展开。政府逻辑主要关注政策环境与制度保障,如政商关系(冯伟,2021)、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王海成等,2025);市场逻辑强调市场规模与潜力(李竹兵等,2024;汪文姣和陈志鸿,2014);技术逻辑则聚焦技术创新和人才供给,如智慧城市(何凌云等,2021)、劳动力成本(Hou等,2021)等。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现有研究普遍假设外资对城市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多关注外资的数量差异,而对外资质量的关注不足,难以适应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可持续增长的要求(袁博等,2024)。第二,现有文献多探讨单一制度逻辑如何影响外资选址决策,较少关注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可能产生的制度组态。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表明政府、市场与技术制度逻辑之间呈现出多元互动的关系,且对高质量外资引入的作用程度不同,因此有必要从制度组态视角考虑多元制度逻辑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制度环境对高质量外资引入的整体性效应。

(三) 理论基础: 制度逻辑理论与高质量外资引入

1. 制度逻辑理论与城市特征的关系

制度逻辑是根植于社会实践和特定历史背景的价值观、假设、信念和规则等,能够为个人或组织的决策提供指导(Thornton和Ocasio,2008)。Thornton等(2012)将制度逻辑细分为市场、公司、职业、国家、家庭和宗教逻辑六类。制度复杂性是制度逻辑理论的核心内容,其复杂程度取决于制度逻辑的数量及其互动关系(Greenwood等,2011)。这为本文弥补现有研究缺口及构建理论框架提供重要支撑。

随着制度逻辑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提出制度组态视角,强调结果是由多种制度因素共同产生的,应从不同制度逻辑相互组合形成的不同制度组态去揭示影响结果的多重制度前因(杜运周等,2020)。中国城市作为多元制度逻辑共存、互补与竞争的复杂场域(赵云辉等,2025),其内部的政府、市场和技术等多元制度逻辑形成了不同的制度组态,从而造成引资差异性(王海成等,2025)。因此,制度组态视角和制度逻辑理论为本文分析城市特征如何共同驱动高质量外资引入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2. 基于多元制度逻辑的城市特征与高质量外资引入

高质量外资引入是指东道国城市吸引具有领先技术研发能力、管理体系和战略资源的外商投资。其战略属性与落地复杂性决定它并非由单一的制度逻辑主导,既需要依托政府逻辑所塑造的良好政商关系与法治环境(冯伟,2021;王海成等,2025),也需要市场逻辑所形成的市场需求与国际城市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汪文姣

和陈志鸿, 2014), 还需要技术逻辑支撑下的创新城市、信息城市与生态城市(Hou等, 2021; 何凌云等, 2021; 宋华盛等, 2022)。因此, 高质量外资引入是典型的受多元制度逻辑共同驱动的城市发展战略行为。以往关于外资区位选择的研究聚焦于分析单一制度要素与外资区位选择的关系, 为界定城市制度要素范围提供了依据(杜运周等, 2020)。通过梳理文献, 本文聚焦政府、市场与技术三种制度逻辑, 识别出政商关系、法治环境、市场需求、国际城市、创新城市、信息城市和生态城市等七个城市层面的制度要素, 以探讨多元制度逻辑对城市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影响机制。

(1) 政府逻辑与高质量外资引入。政府逻辑对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影响主要通过打造健康的政商关系和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吸引高质量外资。

政商关系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 体现了政府逻辑的权威性。健康的政商关系有利于促进政企协同, 通过降低投资成本与风险吸引高质量外资。从成本视角来看, 健康政商关系有助于推动政府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李明洋和张乃丽, 2024), 有助于提高服务效率,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更好地吸引高质量外资流入(冯伟, 2021)。从风险视角来看, 高质量外资属于战略导向型投资。健康的政商关系所带来的制度化、透明化的政策执行机制, 能增强高质量外资的政策预期稳定性(Globerman 和 Shapiro, 2003), 降低因政策突变带来的投资风险, 塑造安全可靠的投资环境。

法治环境体现了政府逻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程度。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强化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 为高质量外资的经营活动保驾护航。一方面, 高质量外资作为技术密集型投资, 技术诀窍、专利等无形资产是其核心竞争力。良好法治环境有助于保护知识产权, 降低侵权后的维权成本(王海成等, 2025)。另一方面, 高质量外资的运营依赖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的配合, 有助于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建立长期的契约合作关系(郭平和胡君, 2023)。法治环境良好的城市契约履行程度高, 能降低合同违约风险和成本(Mann, 2018)。

(2) 市场逻辑与高质量外资引入。市场逻辑下, 高质量外资引入主要与市场需求规模和国际城市建设有关。

市场需求体现了市场逻辑对利润空间与发展潜力的追求。市场需求规模越大, 高质量外资越容易实现规模经济, 摊薄前期的创新成本, 扩大利润空间(张建伟和杨海平, 2017)。庞大且多元的市场需求为高质量外资提供足够的市场试验空间, 推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市场化应用(李竹兵等, 2024)。此外, 市场需求规模越大, 意味着产业集群集中度越高, 可以为高质量外资提供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体系, 降低总体交易成本。

国际城市反映了城市在全球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连增等, 2021)。国际化程度越高的城市, 越有可能成为全球贸易枢纽, 其国际物流设施、税收优惠、外汇流动、第三方服务等配套体系更为完善, 从而降低高质量外资的综合投资成本(王逸飞和张维阳, 2022)。同时, 国际化城市通过跨国合作与经贸往来促进互信互通, 有助于吸引高质量外资(曾辰和叶胥, 2025)。

(3)技术逻辑与高质量外资引入。技术逻辑对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创新城市、信息城市和生态城市建设三方面。

创新城市通过技术研发和知识更新推动经济持续增长(Carrillo, 2006)。高质量外资通常以技术创新为主,更倾向于进入具备活跃的创新氛围和坚实的研发基础的城市。创新城市通常能形成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创新型企业共同构建的创新生态系统,为高质量外资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同时,创新型城市一般聚集了大量高素质人才,为高质量外资提供与其业务发展相匹配的人才支持(陈福中等, 2024)。此外,创新城市具备较高技术吸收能力和知识外溢环境,有助于缩小本地企业与高质量外资的技术差距,促进两者在合作中形成有效互补(黄烨菁, 2019)。

信息城市通过信息化技术(如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与治理能力(何凌云等, 2021),它是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核心影响因素(魏浩和刘缘, 2025)。一方面,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能降低企业的沟通与运营成本,增强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力(张杰等, 2024)。另一方面,信息城市的建设能够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增强外资对城市营商环境的信心(杨青和吉赞, 2025)。另外,信息城市有助于增强城市整体的创新能力(罗奇等, 2025),有助于高质量外资获取更多的创新资源和技术支持。

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杨彤等, 2006)。生态城市在引资导向上更加注重质量而非数量(霍伟东等, 2019),与高质量外资高度契合。一方面,技术创新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内在驱动力,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废气排放处理、水污染处理等领域都需要绿色技术的支撑(姜作培, 2009),有助于吸引注重生态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外资。另一方面,生态城市在气候条件、空气质量、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升了城市宜居性,能够吸引全球高素质人才前来定居工作(宋华盛等, 2022),为高质量外资提供稳定的人才供应。

3. 理论模型:制度组态视角下城市吸引高质量外资的多重路径

现有文献表明,上述城市特征均对外资区位决策产生显著影响,但较少探讨不同城市特征之间的互动及其形成的城市制度组态对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影响。制度组态视角强调结果是由多种制度因素共同产生的,可能存在多种制度组态影响城市引入高质量外资(杜运周等, 2020)。本文从政府、市场和技术制度逻辑出发,归纳出高质量外资引入的三种可能路径(如表1所示):第一,单轮主导驱动路径是指三种制度逻辑间存在竞争与主导关系,存在政府主导、市场主导或技术主导三种类型。第二,双轮组合驱动路径是指两种制度逻辑间存在共生和互补关系,存在政府—市场共生型、政府—技术赋能型、市场—技术牵引型三种模式。第三,全轮协同驱动路径是指三种制度逻辑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协同关系,政府、市场和技术三种逻辑间互补共生。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制度组态视角,研究政府、市场和技术三种制度逻辑的复杂互动关系,选取政商关系、法治环境、市场需求、国际城市、创新城市、信息城

市和生态城市等七个城市特征，探讨其可能形成的城市制度组态及其对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影响。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表 1 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可能驱动路径和模式

引入路径	政府逻辑	市场逻辑	技术逻辑	理论逻辑
单轮主导驱动路径	单一制度逻辑视角			政府、市场和技术逻辑之间存在竞争与主导关系
政府主导型	1	0	0	在单一制度逻辑主导中促进高质量外资引入
市场主导型	0	1	0	
技术主导型	0	0	1	
双轮组合驱动路径	二元制度逻辑视角			政府、市场和技术逻辑之间存在共生和互补关系
政府—市场共生型	1	1	0	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技术、市场与技术等不同制度逻辑组合中促进高质量外资引入
政府—技术赋能型	1	0	1	
市场—技术牵引型	0	1	1	
全轮协同驱动路径	多元制度组态视角			政府、市场和技术逻辑之间存在复杂交互、协同关系
政府—市场—技术协同型	1	1	1	政府、市场和技术逻辑之间协同共生促进高质量外资引入

注：“1”表示该制度条件产生影响，“0”表示该制度条件未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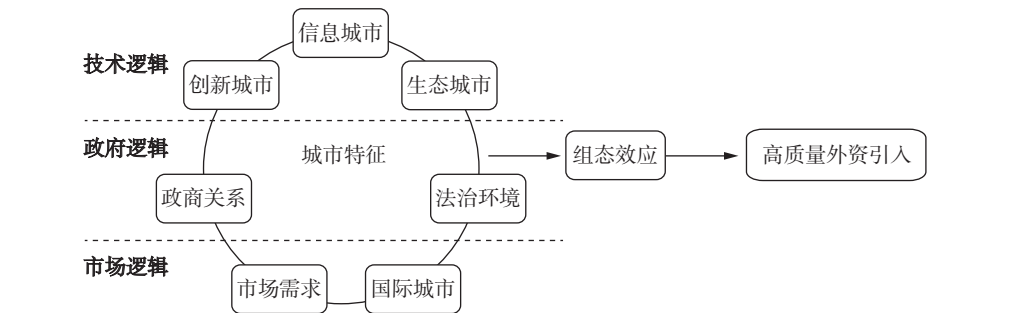


图 1 城市高质量外资引入驱动机制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传统外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主要使用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来分析单个因素的净效应，并假设各因素间相互独立，而 fsQCA 是一种以集合论为基础的方法，能分析多因素间的等效、综合效应(杜运周等，2020)。本文使用 fsQCA 分析不同城市特征对高质量外资引入的作用机制，原因有二：一是高质量外资对城市的制度环境、创新生态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区位条件往往有更多元且复杂的要求，fsQCA 能分析前因要素间不同组合形成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赵云辉等，2020)，有助于从整体性视角揭示城市特征对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多元路径；二是中国城市数量众多且异

质性较高,在吸引高质量外资方面可能存在多条“等效因果链”,fsQCA强调不同前因组态对结果变量存在互不冲突的等效效应(赵云辉等,2020),有助于深入理解城市间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差异化机制。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涵盖2022—2023年中国各城市的高新技术外资企业数量、人口状况、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及基础设施等相关数据,其他条件变量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2022)》《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22)》《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报告》、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官网等^①。基于上述数据,本文构建了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进行分析。

(三)测量与校准

1. 结果变量

高质量外资引入,以2023年每个城市拥有的高新技术资质的外资企业数量衡量,该数据从CNRDS数据库中获取。为了解决反向因果问题及城市对高质量外资引入的时滞性,将高质量外资引入滞后一期。

2. 条件变量

本文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22)》,以及倪鹏飞等(2021)、曹清峰等(2019)、王雨飞等(2018)的研究成果,对政商关系、法治环境、市场需求、创新城市、生态城市、信息城市和国际城市等七个城市特征进行测度。每个城市特征指标下设二级指标,并通过加权平均后计算出一级特征指标得分。具体而言,先采用效用值法对二级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值域为[0,100]),再基于变异系数法确定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并通过加权汇总得到一级指标得分。

(1)政商关系。政商关系根据《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2022)》中各城市的政商关系健康总指数作为衡量指标(蒋长流等,2021)。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分值越大,说明该市的政商关系越健康。

(2)法治环境。法治环境参考《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的评价体系,由社会治安(30%)、司法信息公开度(40%)和司法职务(30%)通过加权计算而得。其中,社会治安数据来自2022年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司法信息公开度来自《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报告(2022)》,司法职务数据来自2022年天眼查官网公布的各地方律师事务所数量^②。

^①资料来源: CNRDS 数据库, <https://www.cnrds.com/> (访问日期 2026-03-06); 《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2022)》, http://nads.ruc.edu.cn/zkcg/yjbg_zkcg/95c66593050845d4b5fdf661d40d4aba.htm (访问日期 2026-03-06);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22)》, http://naes.cssn.cn/cj_zwz/cg/yjbg/csjzlb/ (访问日期 2026-03-06); 《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报告》, 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database?SiteID=14 (访问日期 2026-03-06); 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s://wenshu.court.gov.cn/> (访问日期 2026-03-06);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https://www.cpaffc.org.cn/> (访问日期 2026-03-06)。

^②资料来源: 天眼查, <https://www.tianyancha.com/> (访问日期 2023-03-02)。

(3) 市场需求。参考倪鹏飞等(2021)、曹清峰等(2019)的计算方法,从 CNRDS 中获取 2022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0%)、人口规模指数(20%)和经济活力指数(60%)加权计算得出。其中,经济活力指数是用过去 5 年 GDP 增长指数衡量。

(4) 国际城市。参考王雨飞等(2018)的计算方法,使用国际友好城市(50%)和外贸依存度(50%)加权计算得出。其中,国际友好城市是指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官网获取的 2022 年各城市的国际友好城市数量;外贸依存度通过 CNRDS 获取 2022 年各城市进出口总额,并按(进口总额+出口总额)/(2×GDP)衡量。

(5) 创新城市。参考王雨飞等(2018)的计算方法,从 CNRDS 中获取 2022 年城市专利申请数量(80%)和科学技术支出(20%)加权计算得出。

(6) 信息城市。参考王雨飞等(2018)的计算方法,由航空交通便利程度(70%)和信息交流(30%)加权计算得出。其中,航空交通便利程度通过各城市机场官网和 CNRDS 获取 2022 年民航机场飞行区等级和机场年起降架次数据测量;信息交流以 CNRDS 中获取的 2022 年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万户)测量。

(7) 生态城市。参考王雨飞等(2018)的计算方法,从 CNRDS 中获取 2022 年空气质量(80%)和人均绿地面积(20%)加权计算得出。表 2 描述了各条件变量的测量和数据来源。

表 2 条件变量测量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
政商关系	政商健康关系指数	《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
法治环境	社会治安(0.3)	中国裁判文书网
	司法信息公开度(0.4)	《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报告》
	司法职务(0.3)	天眼查
市场需求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2)	CNRDS
	人口规模指数(0.2)	CNRDS
	经济发展指数(0.6)	CNRDS
国际城市	国际友好城市(0.5)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外贸依存度(0.5)	CNRDS
创新城市	专利申请数量(0.8)	CNRDS
	科学技术支出(0.2)	CNRDS
信息城市	航空交通便利程度(0.7)	机场官网、CNRDS
	信息交流(0.3)	CNRDS
生态城市	空气质量(0.8)	CNRDS
	人均绿地面积(0.2)	CNRDS

三、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 必要条件分析

必要条件分析(NCA)是指通过分析前因条件的必要性效应量及其显著性来识别必要条件,并通过瓶颈水平分析评估前因条件的必要水平值。NCA 提供了蒙特卡洛仿真置换检验分析前因条件显著性(杜运周等,2020)。本文使用 CR 和 CE 两种不同估计方法汇报 NCA 对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前因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需要满足以下要求:一是单个条件的效应量(d)大于 0.1,二是 P 值检验显示效应量显著(杜运周等,2020)。表 3 的 NCA 分析结果显示,政商关系和生态城市的必要性效应均不显著($P>0.05$),这些条件单独不构成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必要条件。法治环境、市场需求、创新城市、信息城市和国际城市的必要性效应虽然显著,但效应量均较小($d<0.1$),也不构成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必要条件。

表 3 NCA 对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	方法	精确度(%)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	P 值
政商关系	CR	100.0	0.000	0.95	0.000	1.000
	CE	100.0	0.000	0.95	0.000	1.000
法治环境	CR	97.6	0.016	0.95	0.017	0.000
	CE	100.0	0.020	0.95	0.021	0.000
市场需求	CR	99.7	0.000	0.95	0.000	0.000
	CE	100.0	0.000	0.95	0.000	0.000
国际城市	CR	100.0	0.004	0.95	0.004	0.003
	CE	100.0	0.008	0.95	0.009	0.003
创新城市	CR	96.9	0.052	0.94	0.055	0.000
	CE	100.0	0.014	0.94	0.015	0.000
信息城市	CR	95.1	0.015	0.93	0.016	0.000
	CE	100.0	0.009	0.93	0.009	0.000
生态城市	CR	100.0	0.000	0.95	0.000	1.000
	CE	100.0	0.000	0.95	0.000	1.000

表 4 展示了瓶颈水平分析结果。瓶颈水平是指单个前因条件在其观测值范围内需要满足的最低水平值(%) (杜运周等,2020)。结果显示,要实现 70%的高质量外资引入水平,法治环境、信息城市与国际城市需要满足的最低水平值分别为 2.4%、2.6%和 0.7%,其他四个前因条件都不存在瓶颈水平。

表 4 NCA 对单个条件必要性瓶颈水平的分析结果(%)

高质量外资引入	政商关系	法治环境	市场需求	国际城市	创新城市	信息城市	生态城市
0	NN	NN	NN	NN	NN	NN	NN
10	NN	0.3	NN	NN	NN	NN	NN
20	NN	0.6	NN	0	NN	NN	NN
30	NN	1.0	NN	0.2	NN	NN	NN
40	NN	1.4	NN	0.3	NN	NN	NN
50	NN	1.7	NN	0.4	NN	0	NN
60	NN	2.1	NN	0.5	NN	1.3	NN
70	NN	2.4	NN	0.7	NN	2.6	NN
80	NN	2.8	NN	0.8	5.3	3.9	NN
90	NN	3.1	NN	0.9	27.3	5.1	NN
100	NN	3.5	1.8	1.0	49.3	6.4	NN

注：CR 方法，NN=不必要。

如表 5 所示，单个前因条件对高质量外资引入(高/非高)的必要性一致性均低于 0.9 的阈值，即不存在产生高质量外资引入(高/非高)的必要条件。

表 5 fsQCA 对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结果

前因条件	高质量外资引入(高)	高质量外资引入(非高)
政商关系	0.701	0.388
~政商关系	0.408	0.722
法治环境	0.673	0.456
~法治环境	0.455	0.674
市场需求	0.708	0.395
~市场需求	0.415	0.729
国际城市	0.752	0.348
~国际城市	0.377	0.783
创新城市	0.780	0.305
~创新城市	0.344	0.820
信息城市	0.641	0.474
~信息城市	0.478	0.647
生态城市	0.609	0.489
~生态城市	0.496	0.617

(二) 组态分析

本文采用 fsQCA 方法分析导致高程度高质量外资引入和非高程度高质量外资引入的组态特征, 以及遵循组态理论化原则(Furnari 等, 2021), 对高阶组态标签化并提炼核心机制。

1. 导致高质量外资引入(高)的组态特征

根据真值表一致性分数缺口, 本文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9, PRI^① 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75, 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 2。通过中间解和简约解识别每个组态的核心条件与辅助条件(杜运周等, 2020)。如表 6 所示, 本文识别出三个高阶组态(C1、C2、C3)能够导致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引入, 并进一步结合理论和典型城市案例概述三个组态的机制, 用“简洁地表达”对组态特征进行命名(Furnari 等, 2021)。

(1) 政府主导型技术驱动(C1)。组态 C1a、C1b、C1c、C1d、C1e 构成了等效二阶组态 C1, 表明以高政商关系、高创新城市、高国际城市为核心条件, 导致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引入。C1 表明, 良好的政商关系作为制度基石能够提升当地政府与高质量外资企业之间的沟通效率, 降低制度摩擦成本, 提升高质量外资对本地经营环境的信任。而且, 良好的政商关系充分保障城市创新要素的释放, 为外资企业提供人才、技术与制度等创新环境。因此, 本文将该组态命名为政府主导型技术驱动。属于这种模式的典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厦门、南京、成都、天津、青岛等。以深圳市为例, 根据全国工商联 2022 年报告, 深圳已连续三年获评“全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城市”^②。2022 年深圳技术创新全球策源力排名全球第五、全国第一;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5.49%, 居全国第二; 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专利国际申请量连续 18 年领跑全国大中城市^③。同年, 深圳进出口总额稳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④, 并与 22 个国家建立产业创新合作网络。深圳市通过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 深度链接港澳及国际资源发展对外贸易, 吸引大量高质量外资集聚此地。

(2) 国内—国际市场协同驱动(C2)。组态 C2 显示, 以高市场需求、高创新城市、高国际城市为核心条件, 导致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引入。C2 表明, 市场规模与消费潜力是高质量外资进入一个城市的重要考量因素。此外, 更高程度的城市国际化水平有助于高质量外资实现国际可达性与全球资源联通, 而城市的研发投入与科研机构密度构成外资企业增强创新能力以满足国内需求和链接国际市场的基础。

①PRI(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 不一致性的比例减少)是衡量子集关系一致性的替代指标, 用于避免某一组态同时成为结果及结果否定的子集。PRI 一致性阈值通常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与需要进行设定。现有研究推荐 PRI 一致性阈值为 0.75, 也有研究采用 0.7 或 0.8 作为判定标准。

②深圳商报, https://hmo.sz.gov.cn/zx/wqzx/content/post_925351.html (访问日期 2025-07-24)。

③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 <https://iss.ecnu.edu.cn/ef/8a/c5517a520074/page.htm> (访问日期 2025-07-24)。

④深圳市统计局, https://tjj.sz.gov.cn/zwgk/zfxgkml/tjsj/tjgh/content/post_10577661.html (访问日期 2025-07-24)。

因此,本文将该组态命名为国内—国际市场协同驱动,即基于国内市场拉动与国际要素联通的双重驱动优势,创造价值。属于这种模式的典型城市包括苏州、宁波、温州等。以宁波市为例,2022年该市GDP达到15704.3亿元,年增速为3.5%;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均GDP为16.4万元,位居浙江省第二位^①。宁波依托世界第一大港舟山港,与22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直接贸易往来,并通过自身卓越的科创能力,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着力打造新型国际贸易中心和高质量外资集聚地。

(3)技术主导型市场驱动(C3)。组态C3显示,以非高政商关系、非高法治环境、高市场需求、高创新城市、高信息城市为核心条件,导致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引入。C3表明,在制度环境(政商关系与法治环境)不高的城市,市场需求、创新程度和信息化程度很高,也会吸引很多高质量外资。相比传统城市,高信息化城市显著降低了外资企业在物流、沟通和数据交换方面的交易成本,提升了供应链响应速度与组织灵活性。此外,信息化还增强了城市与外部世界的连接性。凭借城市信息化优势,高质量外资依托本地创新能力快速实现产品和服务升级,转化为可满足市场需求的本地化解决方案,实现“创新—市场”正循环。因此,本文将该组态命名为技术主导型市场驱动,即通过平衡成本、收益与风险来进行区位选择。属于这种模式的典型城市包括南阳、阜阳等。以南阳市为例,其政商关系排名较低(第216名),法治环境欠佳(第253名),当地市场需求较高(第99名),创新能力和信息化建设处于中等水平(分别为第109名和第227名)。该市2022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55.40亿元,同比增长4.8%;人均GDP达4.7万元,增幅5.3%^②,市场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南阳市着力实施创新企业培育工程,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春笋”计划、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行动和创新型企业树标引领计划,强化核心技术攻关^③。作为河南、湖北、陕西交界区域中心城市,南阳被国务院确立为中部重要交通枢纽,并以“雪亮工程”试点和5G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在全省率先推进5G网络建设,探索5G+创新应用场景^④。

2. 导致高质量外资引入(非高)的组态特征

如表6所示,本文识别出三个高阶组态(S1、S2、S3)能够导致非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引入。组态S1显示,以非高政商关系、非高法治环境、非高国际城市、非高创新城市和高信息城市为核心条件,导致非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引入。组态S2显示,以非高市场需求、非高创新城市、非高国际城市、高信息城市和非高生态城市为核心条件,导致非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引入。本文将组态S1和S2视为一种整体模式,命名为信息导向的技术孤立主导型,即关键制度与能力要素的缺失导致配置性劣势,即使具备信息化的有利条件,也难以实现高质量外资的有效吸引。

①杭州网新闻中心, https://news.hangzhou.com.cn/zjnews/content/2023-02/28/content_8480873.htm (访问日期 2025-07-24)。

②南阳市统计局, <https://tj.nanyang.gov.cn/2023/04-13/33735.html> (访问日期 2025-07-24)。

③南阳市人民政府, <https://www.nanyang.gov.cn/2022/03-21/317162.html> (访问日期 2025-07-24)。

④南阳市人民政府, <https://dsjglj.nanyang.gov.cn/2022/01-25/323288.html> (访问日期 2025-07-24)。

组态 S3 显示,以非高国际城市、非高信息城市和高生态城市为核心条件,上述因素的组合导致非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引入。本文将组态 S3a 和 S3b 命名为生态导向的技术孤立主导型,即使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其也难以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

表 6 导致高质量外资引入的组态(高/非高)

前因条件	高质量外资引入(高)								高质量外资引入(非高)			
	C1					C2		C3	S1	S2	S3	
	C1a	C1b	C1c	C1d	C1e	C2a	C2b	C3	S1	S2	S3a	S3b
政商关系	●	●	●	●	●	—	—	⊗	⊗	⊗	—	⊗
法治环境	—	●	●	⊗	—	●	⊗	⊗	⊗	—	⊗	—
市场需求	●	●	—	⊗	—	●	●	●	—	⊗	⊗	⊗
国际城市	●	●	●	●	●	●	●	⊗	⊗	⊗	⊗	⊗
创新城市	●	●	●	●	●	●	●	●	⊗	⊗	⊗	⊗
信息城市	●	—	●	⊗	⊗	●	⊗	●	●	●	⊗	⊗
生态城市	—	—	●	—	⊗	—	⊗	⊗	—	⊗	●	●
一致性	0.953	0.970	0.973	0.956	0.961	0.974	0.949	0.948	0.956	0.944	0.972	0.965
原始覆盖度	0.403	0.393	0.320	0.077	0.136	0.378	0.097	0.070	0.195	0.145	0.157	0.180
唯一覆盖度	0.048	0.024	0.010	0.012	0.012	0.027	0.009	0.021	0.050	0.019	0.015	0.031
总体一致性	0.937								0.947			
总体覆盖度	0.593								0.322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

(三) 进一步分析

第一,创新是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的必要因素。在所有导致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进入的组态中(C1、C2、C3),创新城市均作为核心条件始终存在,而且在导致非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进入的组态中作为核心不存在条件(S1、S2)或辅助不存在条件(S3)始终存在,表明城市创新能力是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的必要因素。第二,国际化是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的关键条件。在导致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进入的组态中(C1、C2),国际城市作为核心存在条件始终存在,而且在导致非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进入的组态中作为核心不存在条件(S1、S2、S3)始终存在。第三,政府逻辑与其他逻辑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组态 C3 中,当城市的政商关系和法治环境缺乏时,城市市场需求、创新能力和信息化水平能够弥补制度缺陷,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该城市。

(四)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产生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前因组态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依据 QCA 结果稳健的原则,当轻微改变 QCA 操作时,产生的结果间存在子集合关系,并且尚未改变研究发现的实质解释(张明和杜运周,2019)。第一,将原始一致性阈值由 0.9 降至 0.8,产生的高阶组态与现有组态保持一致。第二,案例频数阈值由 2 提高至 3,产生一个高阶组态与现有高阶组态 C1 一致。第三,将 PRI 一致性由 0.75 降低至 0.7,产生的高阶组态与现有组态基本一致。第四,本文运用过去一年 GDP 增长指数衡量经济活力,产生的两个高阶组态与现有高阶组态 C1 和 C2 一致。上述检验显示本文结果比较稳健。

四、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本文基于制度组态视角,以制度逻辑为理论基础,运用 fsQCA 方法对中国 286 个城市进行组态分析,探究了政府、市场和技术三种制度逻辑下七个城市层面制度要素驱动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多元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单个制度要素并不能构成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产生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引入的所有组态中均包含创新城市。具体来说,在所有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引入的组态中,创新城市作为核心存在条件始终存在,且在非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引入的组态中是缺失的,说明城市的创新能力是高质量外资关注的重要因素。第二,基于制度组态视角,导致高程度的高质量外资引入存在三种制度组态:政府主导型技术驱动、国内—国际市场协同驱动和技术主导型市场驱动。第三,城市的政府逻辑与其他制度逻辑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当城市的政商关系和法治环境缺乏时,城市市场需求、创新能力和信息化水平能够弥补这一缺陷,吸引高质量外资流入城市。

(二) 讨论

1. 理论启示

相较于其他外资区位选择相关研究而言,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本文将外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从传统的一般外资转向高质量外资,突破以往研究隐含的“外资同质”假设。本文认为,与一般型外资相比,高质量外资在技术研发、专利保护与产业协同等方面具有更多价值创造能力(王海成等,2025),其对城市的制度环境、创新生态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区位条件往往要求更为严苛和多元,需要单独将高质量外资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紧扣高质量外资以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为主的本质特征,明确其定义并构建相应的测量方法,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清晰、可操作的理论框架与测量基础,更好地契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可持续增长的内在要求(袁博等,2024)。

其二, 本文将制度组态视角引入高质量外资区位选择研究, 拓展了外资区位选择的研究视角。现有研究多考虑单一制度要素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Hou等, 2021; Shangguan和Guo, 2022; 景国文, 2021; 宋华盛等, 2022), 忽略了高质量外资区位选择更容易受到城市多元制度要素的协同影响。城市作为一个多种制度逻辑并存的混合型组织(赵云辉等, 2025), 其制度复杂性直接影响到高质量外资的区位决策。本文将制度组态视角引入外资区位选择研究, 同时考虑政府、市场和技术三种制度逻辑下七个城市层面制度要素对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复杂驱动关系。本文提出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多种可能驱动模式: 单轮主导驱动、双轮组合驱动和全轮协同驱动等。这不仅回应了Hitt和Xu(2019)对制度组态研究的呼吁, 更将这一视角拓展至外资区位选择领域,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其三, 本文将fsQCA方法运用到高质量外资引入的研究中, 系统分析了城市特征与高质量外资引入的复杂关系。现有外资区位决策的研究多使用多元回归分析等传统分析方法, 仅能得到单一要素与外资区位决策相关的结论(王海成等, 2025; Dixon和Haslam, 2016; Assanie和Singleton, 2002), 导致对高质量外资引入前因的理解不够全面(杜运周等, 2020)。由此, 引入fsQCA方法为丰富高质量外资引入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2. 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城市层面优化高质量外资引入提供如下启示。首先, 地方政府需加快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李明洋和张乃丽, 2024), 提高政务办事效率, 推动政府成为高质量外资引入的有力背书。其次, 地方政府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强化与全球市场经济体的联系, 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为吸引高质量外资奠定良好基础。最后, 地方政府需要准确把握高质量外资以技术创新为本质的特征, 大力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形成良好的技术溢出环境(黄烨菁, 2019), 构建持续的区位优势。

[参考文献]

- [1]曹清峰, 倪鹏飞, 马洪福. 全球城市体系的网络结构与可持续竞争力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 2019(6): 39-45.
- [2]陈福中, 罗科, 董康银. 价值链功能升级与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减排: 基于引资质量提升视角[J]. 财贸经济, 2024, 45(5): 159-176.
- [3]陈李强, 黄晓燕, 张玥. 外资进入与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嵌入——新发展格局下的理论与经验分析[J]. 经济学报, 2024, 11(2): 29-75.
- [4]杜运周, 刘秋辰, 程建青.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20, 36(9): 141-155.
- [5]冯伟. “筑巢”与“引凤”: 政商关系对FDI的作用特征与机制分析[J]. 财贸研究, 2021, 32(7): 27-41.
- [6]郭平, 胡君.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稳外资”: 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J]. 世界经济研究, 2023(2): 34-49+134-135.
- [7]何凌云, 马青山, 张元梦. 智慧城市试点对吸引FDI的影响——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1(6): 69-84.

- [8]黄烨菁.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视角下外商直接投资“外溢”的作用机制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19(2): 123-134+137.
- [9]霍伟东, 李杰锋, 陈若愚. 绿色发展与 FDI 环境效应——从“污染天堂”到“污染光环”的数据实证[J]. 财经科学, 2019(4): 106-119.
- [10]姜作培. 着力完善生态城市建设的机制体系[J]. 现代经济探讨, 2009(10): 5-9.
- [11]蒋长流, 江成涛, 郑德昌. 新型政商关系能打破企业创新的政治资源诅咒吗[J]. 软科学, 2021, 35(6): 52-57.
- [12]景国文.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 FDI 的区位选择[J]. 华东经济管理, 2021, 35(12): 43-51.
- [13]李金城, 王林辉, 国胜铁. 高质量 FDI 的技术进步偏向: 经验证据与政策建议[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82-90.
- [14]李明洋, 张乃丽. 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国脉电子政务网的经验证据[J]. 国际经贸探索, 2024, 40(3): 56-74.
- [15]李竹兵, 陆建明, 甄诚, 等.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影响外资进入模式的机制与效果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24(12): 125-147.
- [16]连增, 李超, 胡慧杰. 国际友好城市与中资企业跨国并购——基于 Zephyr 全球并购分析交易库的实证研究[J]. 财贸经济, 2021, 42(10): 147-164.
- [17]刘晔, 占思诺. 环境保护费改税是否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质量[J]. 税务研究, 2024(11): 112-120.
- [18]罗奇, 邓保华, 何小钢. 信息技术应用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J]. 江西社会科学, 2025, 45(6): 80-94.
- [19]倪鹏飞, 徐海东, 刘笑男. 耦合协调度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基于亚洲 564 个城市的分析[J]. 社会科学战线, 2021(2): 70-77.
- [20]沈立, 倪鹏飞, 徐海东, 等. 市场活力、创新能力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影响机制[J]. 城市问题, 2020(12): 24-33.
- [21]宋华盛, 孙桂里, 罗德明. 宜居的城市更吸引外资企业——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2(11): 75-92.
- [22]汪文姣, 陈志鸿. 中国外资区位优势动态调整研究——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时空数据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4(6): 112-122.
- [23]王海成, 张伟豪, 李智伟.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高质量外资吸引——来自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的准自然实验[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5, 42(8): 69-85.
- [24]王俊, 李慧平. 国际循环水平提升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5, 42(2): 51-62.
- [25]王满四, 张延平. 欠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以江西赣州为例[J]. 中国流通经济, 2012, 26(4): 59-64.
- [26]王晓红, 沈家文.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趋势展望[J]. 国际贸易, 2015(2): 41-48.
- [27]王逸飞, 张维阳. 中国城市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职能分异: 基于中资企业海内外扩展的视角[J]. 地理研究, 2022, 41(9): 2448-2464.
- [28]王雨飞, 王光辉, 倪鹏飞. 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测度研究[J]. 经济纵横, 2018(9): 99-111.
- [29]魏浩, 刘缘. 国际客运新航线开通与中国利用外资新优势——基于人员跨境流动成本视角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5, 42(10): 133-155.
- [30]文余源. FDI 理论与区位决策研究述评[J]. 地理科学进展, 2008(2): 60-73.
- [31]杨青, 吉赞. 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信息惠民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 金融研究, 2025(6): 96-113.
- [32]杨彤, 王能民, 朱幼林. 生态城市的内涵及其研究进展[J]. 经济管理, 2006(14): 90-96.

- [33] 杨晓兰, 倪鹏飞. 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起源与发展评述[J]. 经济学动态, 2017(9): 96-110.
- [34] 袁博, 刘玉海, 刘秉镰. 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与外商投资结构优化[J]. 南开经济研究, 2024(1): 146-164.
- [35] 曾辰, 叶胥. 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发展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J]. 经济问题探索, 2025(5): 125-141.
- [36] 张建伟, 杨海平. 市场需求和中国工业行业 FDI 流入[J]. 工业技术经济, 2017, 36(2): 23-33.
- [37] 张杰, 刘冲, 张凯恒. 数字消费何以吸引城市外资流入[J]. 消费经济, 2024, 40(6): 49-60.
- [38] 张明, 杜运周.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 QCA 方法的应用: 定位、策略和方向[J]. 管理学报, 2019, 16(9): 1312-1323.
- [39] 赵云辉, 梁宇奇, 冯泰文, 等. 营商环境生态如何驱动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分析[J]. 管理评论, 2025, 37(2): 57-71.
- [40] 赵云辉, 陶克涛, 李亚慧, 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 QCA 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11): 118-136.
- [41] ASSANIE N, SINGLETON B. The Qual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oes It Matter for Economic Growth[R]. Working Paper of Asia Pacific Research Centre and APRC Productivity Centre, 2002.
- [42] CARRILLO F. Knowledge Cities: Approaches,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s[M]. Oxford, UK: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6.
- [43] CUI L, FAN D, LI Y, et al.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for Attracting and Retain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of Chinese Provinces[J]. Regional Studies, 2020, 54(5): 692-703.
- [44] DIXON J, HASLAM P A. Does the Quality of Investment Protection Affect FDI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J]. The World Economy, 2016, 39(8): 1080-1108.
- [45] FURNARI S, CRILLY D, MISANGYI V F, et al. Capturing Causal Complexity: Heuristics for Configurational Theoriz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21, 46(4): 778-799.
- [46] GLOBERMAN S, SHAPIRO D.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and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3, 34(1): 19-39.
- [47] GREENWOOD R, RAYNARD M, KODEIH F, et al.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1, 5(1): 317-371.
- [48] HITT M A, XU K.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4(2): 1-14.
- [49] HOU L, LI Q, WANG Y, et al. Wages, Labor Quality, and FDI Inflows: A New Non-linear Approach[J]. Economic Modelling, 2021, 102: 105557.
- [50] LI X, XIAO L. The Impact of Urban Green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FDI Quality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Evidence from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24, 175: 106494.
- [51] MANN W. Creditor Rights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Patent Collateral[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8, 130(1): 25-47.
- [52] SHANGGUAN Y, GUO W. Is FDI a High-quality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Changes in the Chinese FDI After HSR Opening[J]. Applied Economics, 2022, 54(60): 6863-6874.
- [53] THORNTON P H, OCASIO W. Institutional Logics//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M]. London: SAGE, 2008: 99-128.
- [54] THORNTON P H, OCASIO W, LOUNSBURY M.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Multiple Paths of Urban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quality FDI Attr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

WU Jianfeng¹, LI Huilan², DING Yixin³

(1. Inamori Business School,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2.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3.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MBA),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High-qualit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ttraction serves as a key driver for cultivating and expanding new engines of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 this study developed a multi-institutional synergy framework encompassing government, market, and technology dimensions. Applying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to analyze data from 286 cities in China, it examined the configurational effects of multidimensional urban characteristics on high-quality FDI attr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No single institutional logic constitute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high-quality FDI attraction, although innovation capacity exists across all configurations. (2) There are three configurational paths for high-quality FDI attraction: a government-led technology-driven path, a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ynergy-driven path, and a technology-led market-driven path. (3) Government logic exhibits a substitutiv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institutional logics. When lacking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logic, market demand,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the level of informatization can offset its function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 and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citi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igh-standard opening-up.

Keywords: High-quality FDI Attraction;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Location Choice; High-standard Opening-up

(责任编辑 祝子白 刘建昌)